

教育之火

● 王梓坤

关于教育的讨论，可谓多矣。如果把有关的书籍和论文收集起来，足可装备一个大型图书馆。这些，无疑是非常重要而且有益的。近来偶观京剧《群英会》，周瑜问孔明破曹之策，请各自在手心写出，结果都是一个“火”字。真是要言不烦，烦言不要。那么，教育事业的那个“火”字该是什么呢？我想许多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写出：“财才”，即“钱财”与“人才”是也。

“财”、“才”相辅相成。人才可创造财富，财富可吸引人才。工作做得好，二者成良性循环；反之，乏财则缺才，缺才更乏财，可不慎哉！

二者都极重要，至于何者为先，这里视具体情况而定。富裕国家如美国，财已基本解决，处于首位的当然是才。我国则反之，大中小学穷字当头，自然以钱为先；个别已先富裕起来的学校，早已动手挖才了。

深知办学必先找钱、而且终生为此奋斗者，当首推武训先生。可叹50年代，这位穷苦的古人竟受到现代人莫名其妙的批判，至今尚未平反。武训为了集资办学，不惜卑躬屈膝，其精神可敬，方法则不必学。集资办学是光明正大的事，不必低三下四。不过我们也该替武训想想，他是一个穷得要饭的人，能有什么办法呢？

办教育要钱，正如抚育子女要投资一样，这个道理谁不明白。但在实际中，各人的态度就不全一样了。

甲公是清高惯了的，正如晋朝王衍，闭口不言“钱”，言钱便俗、便脏、便臭。以此律身，自然不必非议；但他若是教育部门的首脑，那就坏了大事。千万不能选他当校长、当主任、当部长。有一次某领导说：“要钱没钱，要命有一条”。我当时听了，真是大吃一惊，既觉得他有点流气，又想：碰到这位老兄，教育真是倒了大霉。

乙公懂得财才重要，但他只动口，不动脑，更不动手，坐等钱从天降，最多只指使手下人出去跑跑，找到多少算多少，找不到就拉倒，反正五年到期，各奔东西。乙虽比甲稍好，但远不够称职。

再说丙公，他是地方政府第一把手。中央提倡科教兴国，他也高喊科教兴国，反正这不费事。不过科教，特别是教育，乃是“前人植树，后人乘凉”的事，没有急事，办点教育，当然体面；一有意外，便把它抛到九霄云外，改日再见。

丁公则不然，他（她）上任以来，尽管日理万机，千头万绪，但不论怎样忙，他脑海里总装着“财才”二字。他有紧迫感，该动手时就动手，要不然便会坐失良机（须知财才与机遇同在）。他充分利用

手中的权势和自己的名望，从中央到个人，从国内到国外，到处找钱，找不到决不罢休，而自己则一身清白，分文不沾。为了事业，他合理地“争”，耐心地“磨”。不争不磨，分文无着；又磨又争，财源滚滚。果然不出三年，工作便大有起色，人人赞赏。对一个领导，不能期望太高。正如克林顿所说：总统也是人。如果他在任期内，能做好一两件大事，便会众望所归，名垂青史。

我们恳请甲公赶快让贤；乙丙两公努力提高认识，多办实事；更希望丁公再接再厉，不断成功。多一些丁公，多一些有胆有识的实干家，教育事业就大有希望。

所以我想，应该研究一门新学问，叫“教育集资学”，尊武训为学术带头人。研究提纲应包括：各级政府投资，集体（厂、矿、企业、公司等）办学，私人捐资，争取外资，等等。

日本战败投降后的第一任首相吉田茂写过一本书，叫《激荡的百年史》。其中谈到：1945年，日本许多城市化为一堆瓦砾，全国处在饥饿之中；但许多日本人却说：“要使日本复兴，除教育而外别无他途。我们由于战争而使国家荒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给子孙后代，但是至少希望他们受到卓越的教育。”仅仅过了两年，日本

便实行六三制(小学六年,初中三年)教育,长期的坚持和努力“使日本得到复兴的国民素质”,并迅速成为经济大国。

《大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上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要达到4%。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却要办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光靠政府投资肯定不够,必须多渠道筹资,多形式办学。国立学校是栋梁,公立和私立学校也须大力扶持,并保证质量。美国和日本有许多高水平的私立大学,值得借鉴。贫困地区,还可由群众实物助学,如捐赠土地、空房、建筑材料等。人到老年,善心萌发,常思来日无多,钱财何用,与其传之子孙,增其骄懒,不如捐资助学,广结善缘。因此有必要研究富豪心理与家庭动态,彼此两利,皆大欢喜。

讲了半天“财”,现在来说“才”字。这有两重意思,一指高水平的教师和领导,一指优秀的毕业生。

关于师资,人们已经说得很多很多,这固然非常重要。但在宏观意义上,也许更重要的是领导,而对这个最要害的问题,却讨论得很少很少,怕是有所顾忌吧!挑选好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关系到学校若干年的发展,影响是深远的。人们至今思念蔡元培、张伯苓。可惜现在校长的选拔与任命还存在不少问题。人们难以理解,为什么校长就不行呢?国家领导人都可由人大选举,而不是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为什么校长就不行呢?一些学校发展迟缓,与其说是财力不足,不如说是领导班子误事。学校如此,地区和国家的教育部门的领导就更重要了。多少年来,一些教育部门的领导口碑欠佳;反之,冷嘲热讽,或说某

教育局成了收容所,却时有所闻。我们不希望这种现象再发生,并期待着德才兼备的好同志早日走上领导岗位。实话实说,有何不可。

评价一所学校的基本指标主要看其毕业生对社会的贡献和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工厂看产品,学校看毕业生,毕业生看贡献,这道理是再明白不过的。

培养学生,德育应放在第一位;做人做事做学问,首先是做人,做品德高尚的人。政治课非常重要,环境熏陶也很重要。人能改造环境,同时也是环境的产物。旅居美国或新加坡,必须迅速适应那里的法治精神,否则就要遇到麻烦。我说的环境熏陶,指的是教师言传身教、人际友好互助、校园肃穆整洁和美丽等等。当我们来到一所好的学校,就如同进入人民大会堂或登上天安门,精神状态立即升华到高尚的境界,灵魂得到洗涤,一切污秽的念头荡然无存。这显示出环境熏陶的力量。如果能把学校建设成培养高尚情操的场所,四年下来,学生的思想能不发生很大的变化吗?

学校不仅传授知识,更应培养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有人比较我国与美国的教育,认为我国前者强而后者弱。我知也少,不敢随声附和。但近现代最尖端的科技人才很少出自我国,则是事实。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我的反思如下:

现行的学制太长: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硕士三年,博士三年。如果六岁上学,中间太平无事,拿到博士学位已经28岁,在校读书长达22年,多可怕的数字(请原谅我还未计入博士后)。这22年中,有多少东西真正值得学习,恐怕没人做过系统的、仔细调查研究。许多宝贵的时

间,用在死记硬背一些用不着的东西上,真是可惜可叹。在校学习,主要是打好基础,锻炼猎取新知识、新技能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并在某方面学有一定程度的专长,这就足够了。进一步的深造应靠自己在工作中继续努力。教育(或学习)的1/3靠社会,1/3靠自己,靠自己去主动追求,也就是说,我赞成终身教育,太长的学制确实会埋没人才。试问有哪位科学大师或文化艺术巨匠上过22年的学?爱因斯坦、梅兰芳,还是鲁迅?!

其次,学外语的时间太多。从小学四年级到中学、大学、硕士,甚至博士还要学,前后绵延19年。人们常说美国学生如何如何有创造性,学得如何如何轻松愉快,殊不知他们省去了多少学外语的时间。如果也要他学19年汉语,他能轻松得了吗?我决非反对学外语,外语确实很重要,很有用,但如何学,学到什么程度,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再次,就我所知,现行的教学计划是阶段性的,高中管高中,大学管大学。能不能设计一个全过程的培养方案,从幼儿园一直到博士生毕业,那时人们将会发现浪费了不少时间。为青年学子争取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更新更重要的知识和技能,实在是功德无量。回想诸葛亮出山才26岁,牛顿发明微积分时23岁,邓小平在长征路上当政委刚30出头;而现在的青年却要浪费许多灿烂年华,能不让人感到惋惜和心疼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成绩巨大,而且一定会越来越好。以上所说,姑妄言之,白璧微瑕,亦复何伤。

(本栏责任编辑 李 晓)